

訪薩孟武教授

胡有瑞

「狂狷齋的主人」薩孟武教授，是學術界的大老，同時也是一位德行超卓的學者。

他曾爲他「狂狷」的命名，而做了這樣的註釋，他說：「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。」——這不僅是他書齋命名的用意，而且也是他一生做人、做事、做學問的寫照。

認識薩教授已經是廿五年了，說真的，這麼長串的日子中，儘管歲月在流轉，也儘管我也由小孩到了成長，可是，薩教授真

是數十年如一日，歲月對他如似清風，一些也不落痕跡。

清癯、風趣和精神奕奕，一直是他擁有的特質；再加上他的健談，那一口略帶口吃的濃濁福建腔，這些，早已成了朋友和學生心目中的「薩老師的標幟」。

位在潮州街巷口的「薩公館」，是他一來到臺灣的落脚處——那是幢由臺大配住的教授宿舍，寬敞的院落中，襯着一大幢日式木屋。

簡單的傢俱，盈屋的書稿，以及潔亮的地板和乾淨的門窗，二十多年來，一些也沒有改變過。每當屋主李清癯的身影，由內屋走向客廳時，總使人有着「仙風道骨」的飄飄感。

每次，客人來了，他自己應門，一杯清茶，主人和客人可以在空悠、恬靜的客室中消磨多時。健談的主人，燃着一支煙，談古論今，講學問、談道理，或是說武俠、電影，有時更會品評流行歌曲或是文藝小說。淵博的學識，瀟灑的個性，以及無所不談的話題，常使人會忘記了暮靄的來臨，以及時間的飛馳。

常常，我會去看望他。每次的話題都是不同，而每次的內容却是一樣的深蘊，就如同沐浴春風般使人

難忘。因此，就像他的每一位學生般，我總是這樣地告訴別人：他是位可敬的長者，更是位可愛的老人。

杏壇生活

「我過得很快樂，也生活得極有意思。」

這是他七十歲和八十歲生日前夕，所說的同一句話，因為，他的一生中，全是讀書、教書和著書。「一生沒有離開過書本，多樂。」

每當此時，薩師母總會這樣說：「你薩伯伯，這一生沒有做過一天官，只教了一輩子的書。」這時的薩教授，清癯的臉龐上，閃現的是一派怡然自得的快樂感。

「我學的是政治，不過，我個性頑固，這脾氣不能做官。」因此，民國十三年，當他剛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成歸國時，他沒有走上政壇，却走入了講台，同時也攤開了稿紙。

有時，他會這樣說：「從小我就打算學醫的，可惜啊！」

由於他從小數學極好，堂兄們都力勸他應該學理科，學法科太可惜。



民國初年時的青年，真是人人都以「天下國家」爲念，當時，他決定學政治，目的是抱着「以天下國家爲己任」的豪情壯志。

他說：五四以前，青年是以唸法科爲第一，五四以後就改爲唸文科吃香，後來是工科第一，沒想到來了臺灣竟是學醫最吃香。

抖抖寬大的衣袖，他會這樣說：「如果我當年學了醫，我現在就發財了。」話還沒有說完，他自己總會笑了起來。

不可否認的，當年他學成還鄉時，內心必然經過掙扎：是從政，還是教書？思量又思量，他毅然地作了這樣的結論：「與其做個無法實現自己抱負的官員，還不如過過淡泊逍遙的教書生活。」

剛教書時，他是在上海大夏大學和復旦大學兼課，那時他仍擁有一股年輕的衝動，於是就辦了份「孤軍」雜誌，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，以及宣揚愛國思想。

「孤軍」只辦了半年就停刊了。時間雖短，而且也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而當年的種種，薩教授今日回想起來，仍然清晰在目，而且是興味盎然。

「孤軍是份反共的雜誌，那時，青年黨的陳啓天、李璜等，隔兩週我們必定談一次。」

他還記得，當五三慘案發生時，他就到街頭巷尾去發傳單，喚醒民衆的敵愾同仇。

民國十七年，他到黃埔軍校去教書。「一起在軍校的有倪文亞、陶希聖、張九如……等，陶希聖是總教官，我是編輯主任。」那時，他又接辦了新生命雜誌。

民國十九年，他轉入中央政治學校任教，一教就是十六年，從紅紙廊到青木關，而「薩他老師」就以自己的博學，以及淡泊的心懷，孕育了不少中華民國的政治人才。

立法委員吳延環曾這樣形容過他心目中的薩老師：「先生性樂觀，重然諾，出語幽默，不拘小節。生平無求於人，而喜提携後進，凡有所求，必予鼎助，成功之後，且常忘其姓名。又廓然大公，不念舊惡，既不爲人所忤，亦無嫉惡之人。對於及門弟子，尤能循循善誘，說理深入淺出，闡釋亦莊亦諧，使上其課者，如沐春風，久聽不厭！講課時，略帶口吃，迄今與六、七十歲老同學話舊，對『薩孟武』，無不稱道。」

不置。」

來到臺灣，他又執教臺大，同時做過十一年的法學院院長。

在臺大教授羣中，「薩老師」的課是極具盛名的，每堂課擠滿了學生，選課的固然是多，還有很多外校學生站在走廊上聽。

上課時，他從來沒有講義和教材，總是侃侃而談，兩、三小時絕無冷場，而學生們下得課來，總能心領神會，回味無窮。

「教書一定要懂得學生心理」，他認為，先生授課，可千萬不能「照本宣讀」，不然必定會使學生覺得討厭。「必須講得活一點，學生才不會覺得枯燥。」

教書教了整整五十年，兩年前他才正式從臺大退休，不過，到現在為止，他仍然還是教授，因為，仍有十個碩士學生由他指導修習「中國社會政治史」。

雖然他一直是臺大的專任教授，「不過，我沒有拿過薪水，我一直是拿鐘點費。」因為，他是立法委員，在學校不能拿薪水。

對薩教授來說，這一生最大的收穫是「桃李滿天下」。「我有文學生，也有武學生。」這是他最值得

驕傲的。

由於他執教過的學校多，教的又是政治學，因此，五十年後的今天，不少政壇上的顯要和金融界的巨子，還有軍中的將領，全是他的學生。

在抗戰時，生活的清苦，以及一分同是「淪落人」的心懷，那時他的學生就如同他的家人，學生常往老師家跑，打牙祭，或是述說個人的私事，老師與弟子早已打成了一片。

學生們都知道他淡泊的心性，也了解老師清淡的生活，當薩教授八十壽辰消息傳出時，學生們都想要好好地孝敬這位恩師。無奈，薩老夫子特別表示：「不收禮」，而且執行得極徹底，就這般，壽堂裏，只備白葡萄酒及花生米，好多他昔日的學生，如今的知名之士，在壽堂中徘徊不去，大家都默默地要將一份深摯的敬意向老師表露，那情景是真的很感人的。

求學與著作

七十多年前，才七、八歲的薩教授，寫下了他這一生的第一篇文章：「人不可不讀書，何也？讀書方有知識，而能治國平天下。不讀書則無知識，不能治



(薩孟武教授伉儷)

國平天下。不觀乎匡衡乎，他乃牧羊兒童，因能勤學，終登宰相之位，故人不可不讀書。」

「那年，家鄉發生風疫，全家兄弟都從小學中輟學，逃到親戚家，大家就在親戚家塾中讀書，老師姓陳，舉人出身，要我學做文章，當時我想作文不難，必定第一句是起句，以後一正一反，再加引證，最後則作結論。」

這第一篇文章很受到老師的讚賞，從此，使得他極喜歡寫文章。

薩教授很愛回憶幼時的讀書生活。他常說：「小學時，我的國文、數學、歷史三科成績最好。」儘管是這樣，不過，在學校他沒有拿過第一名，因為，他的音樂、圖畫、寫作三科成績較差，一直等到畢業考，副科成績不算，他才拿到了第一名。

他認為，幼時讀書，教課老師的好壞，對學生影響極大。

雖然已經是八十歲了，在薩教授的記憶深處，仍念念不忘小學時的啟蒙師。「我的歷史成績一直很好，而且，對歷史的興趣一直持續着。」

「擔任歷史課的是黃季芳老師，課本是商務印書

館出版的小學歷史教科書，內容雖然簡單，而比之今日高中，甚至大學的課本，也許還詳細一點，黃老師常摘要通鑑，寫在黑板上，令學生抄在書上，以補充課本之不足，這不但增加我對歷史的知識，且又培養我對歷史的興趣。」

「過了半年之後，我又認為黃老師摘要的還是簡單，乃自己參考通鑑輯覽及其他有關書籍，如廿二史劄記之類，課本原文用大字，所加的註用小字，寫在稿紙上，每一百頁訂成一本，全部共十二本。這是我第一部的寫作，當然不配稱著作，只是抄書。」

「擔任古文的是石慕齋老師，每星期要讀兩篇文章，每星期也要寫兩篇文章，文章有史論和經義，史論可自由發揮意見，經義的作法，則有一定的規則，至於遊記則很少做，唐宋八大家之中，只唯柳宗元會寫遊記，可知遊記是不容易寫的。作文題目以史論為最多，文章做好的，老師即拿來掛在玻璃櫥內。」

自然，薩教授的作文，是每篇都貼在玻璃櫥內，「我掛都掛厭了。」說完，他仍為六十多年前的得意事而有着無比的興奮，一顆掩不住的不老的心靈。

閒談中，他每每愛說從頭的，是——「我從小算

術最好。」接着，他必說這段故事：

「我對算術頂感興趣，四則問題，不過龜兔、時針、父子年齡，以及工程數種而已。每作習題，陳叔良老師一定叫學生想想，全班學生答不出來，他就問我：「算術師，你以為如何解答」，我毫不思索的，立即答道，『以一代之』。」

「算術師」的稱號，對學政治的薩教授來說，一直視如珍寶的拱在記憶的深處，每每憶起，嘴角仍然漾着得意的微笑。

在課堂上，他教了幾十年的政治學，不過，回到家中，他却是一位成功的算術老師。

這十多年來，他是他外孫的家庭教師和好朋友，外孫的功課全由他教，當然也包括數學在內，「再難的題目，我照樣能解。」

當新數學使用時，學生們常常聽不懂，薩教授教外孫，可是，只要一講，他的小學生立即就可以心領神會。

他說：「譬如集合，我就說，就好像是關羽、張飛和趙雲，有時候兩人一起出戰，有時一人出戰，如果三個人某天生病了，就是空集合。」

他搖搖頭嘆息着說：中國人喜歡用奇怪的名稱，表示自己的聰明，其實，用「組」比較容易懂，而偏偏用集合兩字，學生就看不懂了。

他常說：「我講課喜歡自己編教材，不喜歡用別人的書。」

三位良好的啓蒙教師，奠定了這位學人一生做學問的基礎，也開啓了他智慧的靈竅。

十七歲時，他東渡日本，先讀第三高等，接着進入東京帝大。

「當年，我原是以第一名考進第一高等，不過，我志願入第三高等，因為：京都安靜、古樸，是讀書的好環境。」

三高畢業之後，即入京都帝大法學部政治系。這是他回憶中的片斷。

「法學部分爲法律、政治、經濟三系，其中以政治系學生最少，最多廿多人，中國學生只有我一人。」

「政治系的課程大部分是法律系的，小部分是經濟系的，而政治系的課程特有的數種，即政治學、國法學、政治思想史。」

「大學上課，必須記筆記，而筆記時，耳聽、手

寫、目視，這樣一來，已經記得一大半了，以後考試，也覺容易。」

在日本求學時期，正是馬克思思想最濃厚的時候，薩教授還記得經濟系的河上肇教授，就是馬克思主義者，「不過，我聽完後，一點也不贊同這種思想，回國後，正值寧漢分裂時，我就立即加入了國民黨。

薩教授說，這一生學的是政治學，教的也是政治學，可是，無論是讀書時，亦或後來教書時，唸的書中，政治學的書反而少，大半都是唸經濟系或法律系的功課較多。

「在日本求學時，我一有空就看參考書，考試，不過應付而已，有了錢就買書，有了空就看書。」

最有趣的是，當時在日本，看完了的書，可以拿出去賣或是拿去當，而且可以賣很好的價錢。「用這個方式，我就可以看很多的書。」

記得有次去當舖賣書時，路上遇到周佛海，薩教授問他去那裏，周佛海說去圖書館。「他問我去那，我也說到圖書館，但兩人都不願意同行，沒想到，一走入當舖，周佛海已經在那裏了，兩人看了不禁相視

而笑。」

每拿到一本新書，「我必定仔細地看過全部，而且，用紅筆劃下重要的。」用紅筆點書，已成為他數十年的習慣，「一拿起書，也一定會拿起紅筆。」

在他七十歲生日時，整整四大冊的「中國社會政治史」已經完稿出書，當時，他很興奮地說：「書寫成了，三十年的債務總算還清。」

寫一部書，這一直是薩教授多年的心願，而在中國社會政治史完成後，這十年間，他又着手完成了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。

真正提筆起草「中國社會政治史」的時間，是在民國廿四年，「第四冊完成時是民國五十四年，合計共三十年，中間有八年，將時間花在政治學的著作及修改，實際寫作的時間共花了二十二年。」

「寫書時，我是先搜集資料，而要搜集資料，必須腦中先有一種觀念，依此觀念，作成每朝歷史的目錄，而後依此目錄，去搜集所需要的資料，否則，一部廿五史看了又看，也必毫無結果。」

「搜集資料先由正史開始，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，例如後漢書，我前後看了三遍、一字一字的看下

去，第一次覺得毫無資料，第二次略有所得，第三次才有收穫。」

在寫作這本書的歷程中，由於遷徙流離，薩教授曾遺失過全部的書稿及寫作提要。

他說：「抗戰時，爲了節省時間，卡片的作成、不用抄寫而用剪貼，民國三十五年復員時，我們全家坐飛機回東南，衣物及書稿，則委託中央政校運送，沒想到，船到三峽竟沉了。而我十數年搜集的資料卡片就全部毀了，說來真傷心。」

就是這個原因，後來，他一直心疼得不願再到政大去執教。

「來到臺灣之後，不得不購買藝文社出版的廿五史兩部及各種文集各三部，再行閱讀一遍，我雖然沒有一目十行的本領，却能一字一字的快讀下去。」

說到廿五史，薩教授說：「一部廿五史中，他認爲，以漢書最好，「漢書列傳不是依官之大小，而是依事之有無，而事又與國家治亂，典章制度、士風民氣有關，如李廣不得封侯而有傳，其從弟李蔡做過丞相而無傳。」

當四大厚冊的中國社會政治史出版以後，他的心

中雖然覺得輕鬆、愉快，只是另一重責任又襲上心頭。「我要以餘年將清朝這部分寫完。」

前些日子，當我去看他時，他說：「今年我一定寫完中國社會政治史的清史。」

他說，他正在看清史，「我的方式是，全部看完了再寫。」

「在他的書房中，層層疊疊的堆着不少的文稿，多年的習慣是，他寫書信、作文章，必定先打草稿，而他的字細小而草，於是抄稿認字的責任，又全由他自己負責。」

對寫作，他有份狂熱，除了中國社會政治史外，他出版過中國憲法論，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及那部膾炙人口的水滸傳與中國政治。

「那是我抗戰前，無意中所寫的，用輕鬆的筆法，一共寫了廿多篇。」

對這部遊戲之作，他也極喜愛。「我是剖析中國的社會，不是用考證，也不是文學家的眼光，而是以水滸傳來看中國社會的種種。」

除了寫書，他也愛寫雜文。

還記得，當中央副刊方塊的盛時，「本炎」的方

塊是極受人注意的，文筆犀利，立論公正，且語帶詼諧，短短的五、六十字，涵蓋了萬千的鈞勢，而「本炎」就是薩教授寫方塊的筆名。

這幾年，每次看到他，我都極力游說他重執「本炎」文筆，而他總是笑笑，然後說：「好久不寫了，就懶了下來，如果有人逼，也許我還是會寫。」

在他的眉宇及神色間，依然可以知道，他也極為陶醉「本炎方家」的歲月。

學問與嗜好

成為一位學養精深的政治學權威，我曾問過他，為學的方法是什麼。

薩教授說：「最初要廣，才能求深。」

他認為，學政治學的人，一開始，各種書都要看，政治學、法律學、經濟、歷史……看得多、看得博，然後再求深，可不能一下就往深處走。」

自然，學政治，是與社會科學各門功課都有關聯的，「講法律，必須知道社會心理才行，研究歷史，也須知道時代思想。」

他常對學生說，上課時應專心聽講，好好記筆記

。「上課聽了、記了，就等於記了一大半，考試時就方便多了。」

而課餘，他勸告學生，一定要多看參考書，一部的看，知識累積，學問的根基自然就定了。

雖然，已經邁入八十歲，而看書，依然是他的嗜好，各種報章雜誌，各行的新書新知，他都津津有味地看，或是批評。

有次，他曾對我暢說文藝小說，而一些著名作家和書，他都如數家珍，而且對每一位作家的優點及缺點都精確無誤的指出，他坦然地說：「我認為一些女作家的書不壞，像瓊瑤，她的作品，就有她獨特的一面。」

從鄉土小說到文藝小說，他的批評和感慨是：「都找不到一本足以代表這一時代的作品。」他認為，好些國內作家的作品，寫作的內容、範圍及眼光都太侷限了，「以大家的才華和文筆，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的。」

對武俠小說，薩教授更是有名的武俠迷。不過，他曾對我這樣說：「我是愛看，只是，我也沒看過幾部，不少的書我是重覆又重覆的看。」

他將武俠小說視為日常的消遣，只是，好的武俠小說難求，他只有一遍又一遍的重覆看舊書。

他曾說過，武俠小說中的武，是指動的武藝，俠是扶弱鋤強的行為，可惜現在的武俠小說都是靜而不動的，光是口頭上說武而不動武，有的又全寫些神怪的故事，不過這種神怪的描述，比起封神榜、西遊記來又差得太遠。」

認識薩教授的人，都愛說這樣一個笑話，說薩教授的錢「從黑板中來，白板中去。」

每聽此言，他就哈哈大笑，他承認，自己偶爾作方城之戲，但這句話，不是他創的，而是在南京時另一位友人說的名言。

對打麻將，他有他緊守的原則，那就是不斤斤計較勝負，對手限於知交，決不與生人同桌，「全然是消遣又消遣。」

他曾說過：人類素性好鬭，我們既然不能在實際事物上互爭，那就只好在方城中過過互鬭相爭的癮了，「而且天下事如果是必贏的就沒意思，方城之戰妙在輸贏各佔其半。」

以前，他藉麻將作為調劑工作的藥石，在講課覽

書之餘，頭腦借着消遣來稍事休息後，亂如夢絲的資料往往就找出了頭緒，有時還會對事物產生出適當而中肯的處理方法。只是，現在他已捨棄了這項嗜好，「年齡大了，體力也不適合了。」

在年青時，薩教授還是個圍棋好手，他和吳清源及林海峯的父親，在日本留學時正巧是同窗，沒事時大家常一塊下棋，薩教授說：「圍棋的學問太大了，要背棋譜，也得有天才，何況我性又急，所以一直下不好。」

幽默、風趣，一直是薩教授吸引人之處，如今，除了寫稿、看書，他就愛看電視，或是與外孫結伴四處逛逛，每當少棒賽舉行時，無論是深夜或白天，他必定聚精會神地觀戰，那分神態，年輕而沉醉，而當祖孫兩人手牽着手高高興興逛街時，那分神采，更是快樂而純真。

清風與淡月

教學生、寫文章，即或是交朋友，薩教授說，他秉持的原則是「說真話」。自己喜歡的話就說，真真實實的對人。

他常說：「這一生，我沒有養生之道，竟然活了八十年，我想只要心中沒有雜念，得失置之度外，命一定就會長。」

這八十年中，他過的是清風淡月的生活，悠雅愉悅的日子，當然，其間有過波濤，有過煩憂，只是都為他淡泊的心性所化解了。

他說：「罵我，我從不辯，講我，我從不管。」於是，他的生活中沒有紛擾，有的只是清悠的雅事。

每天清早，他必定在院子中散步，一圈又一圈，薄暮時分，提着水壺，他為園中的花草灌水施肥，看着院落中盛開的花朵，他的笑容就更滿足而怡然。

他與夫人年輕時結縭至今，已經六十年了，兩人相依相伴，一直相敬如賓的共渡人生。他常說：「夫妻間不必爭吵，一個說，一個讓，不就沒事了。」

因此，廿多年來的薩公館，屋宇依舊，陳設依然，就連那氣氛，以及屋中的一對主人都一些改變也沒有，簡樸、清悠而自然。

時光過去了八十年，而薩教授却始終擁有着率真、淡泊和寧遠的心性，一直散發着典型中國讀書人的馨香。